

# 中共能成為美、日的可靠夥伴嗎？

尹慶耀

\*\*\*\*\*

一

蘇聯有意把美、日、中共的關係，渲染成三角軍事同盟，那是過分誇張。日本早已聲明它不與中共軍事結盟，美國也只把中共當作「朋友」(friend)而非「盟友」(ally)。對美國和日本而言，中共不能成為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所謂「夥伴關係」(partnership)中的「夥伴」(partner)，也還是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

依作者的瞭解，在尼克森主義的最初設計中，中共並非與美國平等合作、分擔責任、共維世界安全的夥伴；而是存有歧見但為避免戰爭，可用對話來緩和緊張的談判對象。

變化發生在一九七五年以後，起先是越南，其次是安哥拉、非洲之角，然後是一九七八年五月的薩伊事件……，蘇聯利用代理戰爭不斷從事擴張，同時又藉中共指為「莫斯科手中的絞索」的「友好合作條約」方式<sup>①</sup>，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Rimland)及非洲沿岸廣佈戰略棋子。這種情勢促使自由世界不能不予注意。一九七八年五月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訪問北平。同年下半年起，中共雖未放棄毛澤東「三個世界」的「戰略規定」，但將其對外活動的重點，移向第二世界的日本和西歐，以及第一世界中的美國。這些都可看作是對蘇聯擴張行動的反應。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中共與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sup>②</sup>，該約第二條為：「締約雙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與美國發表建交公報<sup>③</sup>。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之第二項為：「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

註① ▲新華社▽記者述評：「『友好合作條約』——莫斯科手中的絞索」。文中指蘇聯除了它的「大家庭」成員國外，一九七一年以來，它已同十二個國家訂有這類條約。見該社(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北平電。此後，蘇聯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又與敘利亞簽訂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條約。

註② 「和約」全文刊「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三版。

註③ 「公報」全文刊「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版。

中共能成為美、日的可靠夥伴嗎？

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雖然中共日本的「和約」第四條表明：「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關係的立場」。中共和美國的建交公報中，也載明：「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但期望蘇聯在這個敏感問題上不受刺激是不可能的，更何況中共和日本的「和約」成立後，中共的「人民日報」立即鼓吹「反對霸權主義」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鮮明地把『反霸條款』載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是國際條約中的一項創舉」<sup>④</sup>。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底訪美時，曾強調「美國、中國（共）、日本、西歐和世界其他國家聯合起來，這些國家聯合起來對付蘇聯霸權主義」<sup>⑤</sup>。爲此，蘇共理論雜誌「共產黨人」(Communist)曾以「北京昨天是帝國主義的後備力量，今天是它的盟友」<sup>⑥</sup>爲題，對中共大事抨擊。

蘇聯誇大了中共同美國與日本關係中對抗蘇聯的意義，中共也似乎有意造成這種印象，它們在利用此一問題作鬭爭。

## 二

獨立的國家之間，如果彼此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相同的制度，或者在這些方面雖不盡相同但至少也不彼此相悖，那麼夥伴關係就容易建立而且可以持久，否則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困難。

美國、日本和中共，都對蘇聯的向外擴張心存警戒，在這一方面是彼此相同的，雖然在警戒的程度和對抗擴張的方式上仍有歧異。此外，美、日把擁有十億人口的中國大陸，看作一個廣大的潛在市場，能在貿易和資源開發方面使美、日獲得一些經濟利益，也不失爲謀求接近的原因之一。

一九七九年八月，美國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F. Mondale)訪平，他在「北京大學」講演時，就強調美國和中共的「共同利益」，平行的「戰略意義」。他說：美國和中共面臨著三方面的基本挑戰，就是爲了共同的安全建立具體的政治聯繫；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文化關係；以及爲了雙方的利益建立切實可行的經濟聯繫<sup>⑦</sup>。他的話說明了美方的動機，而中共不僅想拉攏美、日組成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更有意引進美、日的資金、技術與設備，來推進自己的四個現代化，雙方的動機，似有若干吻合。然而，在實際關係的發展方面，却遇到一些不易克服的困難，因爲美、日和中共，畢竟是不同甚至相反的兩種體制。

註④ 「人民日報」社論：「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熱烈祝賀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見該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第一版。

註⑤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同美國新聞工作者共進午餐時的談話，「人民日報」（同年二月二日）第二版。

註⑥ 「共產黨人」（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第四期，「莫斯科電臺」並於同年三月廿六日至三十一日連續播出。指中共爲帝國主義的後備力量，乃布里茲涅夫(Leonid I. Brezhnev)在一九七六年二月蘇共第廿五次大會報告中語。

註⑦ 「新華社」（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七日）北平電，「人民日報」（同月廿八日）第五版。

中共目前執行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路線，三中全會路線乃是鄧小平路線。由於鄧小平說過：「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那樣的話，因此他被人稱為「實用主義」，也有人稱他是「中國的」黑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ëv），不過在和義大利女記者法拉茜（Oriana Fallaci）談話時，他自己竭力否認<sup>⑧</sup>，並且對黑魯曉夫大事抨擊。在鄧小平的路線下，中共想造成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形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國大陸開啓了「民主窗」，北平以及其他大城市的「民主牆」上，大字報如雨後春筍。最初，這對鄧小平打擊文革受益派是有利的。稍後，大字報和地下的民主刊物，却反對特權、要求法治，主張「衝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束縛，去尋找和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sup>⑨</sup>，這已是向中共的基本信仰及其統治基礎挑戰。為此，鄧小平曾於一九七九年三月被迫自我檢討，四月間，他所提的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正式推出，接著是封閉民主牆，將民主人士、人權鬥士逮捕判刑。中共雖仍強調「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但文藝政策又已收緊，而「林、江集團」的審判，也只是將「公審」大會的政治報復移向法院，法律也仍然要為「階級」服務。

在蘇聯，黑魯曉夫時期曾放寬文藝及一般思想的尺度，到布里茲涅夫時期就又行收緊。中共的情形也與此相彷彿，只是放和收都由鄧小平一人為之而已。這證明共黨制度下，不能有一個開放性的社會，因為那會動搖它的統治基礎。如果細加推敲，除了所謂毛澤東思想以外，四個堅持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共黨國家，也許程度上略有差異。這不是局外人可以影響、改變的。

### 三

開放性的社會同封閉性的社會從事交流，會有不少困難。共黨國家對外國外交官的旅行嚴加限制，中共自然亦復如是。外國記者採訪，不會完全自由。儘管為了賺取外匯而開放觀光事業，但外國旅行者不能自行安排旅遊場所，很多地區或城市，是不准外人進入的，隨行的譯員也往往負有監視任務。

在學術交流方面，中共對美國和日本高度的科學技術極有興趣，派出留學生去從事學習。這些留學生所領費用有限，生活拮据，活動範圍窄狹，無法體會當地的社會文化。中共如此作法，除財政支絀外，它還希望留學生只接受留學國的實用技術，不感染其自由思想，也是原因之一。

中共願以極少代價迅速獲取美、日現代化公司企業的技術情報，惟因本身科學技術落後，委實無以回報。而中國固有的豐碩文化，又是中共所反對的、要「破」的對象。不過，近年來中共確曾將出土文物加以利用。對內，它以階級觀點加以評斷，用來

註⑧ 鄧小平於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一、廿三日與歐利安娜·法拉茜談話，見香港《七十年代》（同年十月號）五〇—五九頁。

註⑨ 魏京生主編的《探索》中語，轉自中共《解放軍報》（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社論「沿着正確軌道解放思想」。

證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正確，從事階級鬭爭的教育。對外，或用以招徠觀光客賺取外匯，或出國巡迴展覽藉收宣傳效果，對爭取華僑向大陸「認同」(Identification)「回歸」(Returning)，也期待會有一些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前在歐、美、日留學的老一代知識份子，大都受到政治迫害。中國大陸現有的科技及經營管理人材，是曾在蘇聯學習或在中共原有的(其實也是學自蘇聯)體制下養成的。在中共重新強調以「自力更生」為主，把基建投資削減百分之四十五，並大量取消與外商簽訂的合同與合作計劃的現況下，它只能在原有企業中挖掘生產潛力。這些原有企業中，仍是蘇聯的技術設備與組織體制，將來從美、日及其他西方國家學成歸國的中共學生，其所學將無用武之地，且極可能受到原有科技人員的歧視，那對學術交流會不會有所影響，是值得注意的。

#### 四

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對彼此貿易與經濟合作的影響，要比對其他方面的影響小些。蘇聯、東歐都和西方國家有貿易及經濟合作事項，這個集團還欠西方七五〇億美元左右的債款。近年來，蘇聯、東歐集團的經濟情況不佳，已使得西方有些就心。

一九七八年二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的報告，以四個現代化為重心。這並非現代化口號的第一次提出，但可說是第一次認真實施，單止那個包括一二〇個大型建設項目，截至一九八五年止的「十年規劃」，就很富有吸引力。根據蘇聯方面的資料，從四化的提出到一九七九年初，外國廠商和中共簽訂的工廠設備(plant)大型輸出契約總額，已達三〇〇億美元，部分外商認為到一九八五年止，僅僅向中共輸出工廠設備一項，即可有七〇〇—八〇〇億美元之譜。又截至一九七九年五月底，中共以各種形式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的融資協定總額，連同交涉中者已達二二〇億美元<sup>⑧</sup>。不過，也就在此時，情勢就有了改變。因為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就決定開始調整經濟。如今調整期已由三年延長為五年，或許更要長期化。「十年規劃」業經擱置，基本建設戰線要大力縮短。截至本文執筆時，中共對美、日、西德中斷契約總額已達美金二五億元，日商因此所受損失約六億五千萬美元，而毀約事件仍層出不窮，要求中共賠償問題不易解決，日本的中小企業蒙受重大打擊。美國進出口銀行已撤回對寶山鋼廠的六、〇〇〇萬美元融資<sup>⑨</sup>。中共對日本政府應允的日元借款，也一時無法消化。這些都會影響中共的國際信譽。美國估計一九八〇年美國和中共的貿易總額約為五〇億美元<sup>⑩</sup>。日本貿易振興會估計同年日本和中共的貿易總額約九四億美

註⑧ 原為蘇聯APN通信社稿，轉自日本《世界情勢》雜誌(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出版)第二四卷二號四二頁。

註⑨ 日本《朝日新聞》夕刊(一九八一年二月五日)第二面。

註⑩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六日)第二面。

元<sup>13</sup>。就成長率言，二者都是相當高的，但絕對數字仍低，在美、日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有限。且展望將來，中共的對外貿易也不易提高。

中共自稱一九八〇年對外貿易總額五四六億「元」（折合美金三六〇億元左右），惟其貿易赤字已連續三年。姚依林稱，中共一九七九年貿易逆差一八億七、〇〇〇萬美元，一九八〇年為五億七、〇〇〇萬美元。

中國大陸現有一億多人口挨餓，城市失業人口二、六〇〇萬。去年財政赤字一二一億「元」，通貨膨脹率百分之十五。一九八一年的基本建設投資要由原計劃的五五〇億「元」，減為三〇〇億「元」。其他行政管理費、各項事業費乃至國防費都要壓縮<sup>14</sup>。現代化目標已壓低到公元二〇〇〇年時，大陸國民平均收入八〇〇美元<sup>15</sup>。在此情況下，無法預期中共能成爲美、日的重要貿易夥伴。

## 五

共黨國家內部的權力鬭爭，乃是普遍的現象。由於個人缺少創業機會，人們必須爬上權力高位始能出人頭地，而權力轉移既無法定程序，你爭我奪自然在所難免。不過，中共的權力鬭爭，另有其嚴重性。

毛澤東堪稱中共的史達林（Joseph V. Stalin），但二人遭遇不同。史達林在黨內大整肅，在列甯（Vladimir I. Lenin）直接領導過的一九二一年黨中央四十一名中委中，能够倖免於難而活到現在的，只有九十一歲的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一人。史達林本人，在生前從未失權，因而蘇聯中央的權力基礎也未會動搖。中共的情形不同，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不僅修正了毛的經濟路線，在其他方面也不大聽毛的指揮。毛澤東失了權，跑到上海另組「小中央」，然後利用林彪的槍桿子支持向北平的「大中央」反攻。在文革期間，中共內部「一分爲二」，有兩個司令部（資產階級司令部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對峙，毛澤東以「造反奪權」的方式鬭倒了政敵，他把階級鬭爭帶進黨內，這種嚴重情況是中共特有，其後遺症使中共迄今難以安定團結。

鄧小平自稱有三次死亡和三次復活的經驗<sup>16</sup>。那是：一九三二年被王明（陳紹禹）拉下台，遵義會議後毛澤東讓他復職。文

註<sup>13</sup>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一年二月廿日）第八面。

註<sup>14</sup> 參閱姚依林在五屆「人代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關於調整一九八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財政收支的報告」，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第三版。

註<sup>15</sup> 鄧小平於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會見日本衆議院副議長岡田春天（Okada Haruo）時語。香港《文匯報》（同月十七日）第一版。

註<sup>16</sup> 鄧小平與法拉西的談話。

中共能成爲美、日的可靠夥伴嗎？

革期間他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下台，一九七三年毛澤東調他回北平。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後，他又被趕下台。同年十月十日，鄧寫信給華國鋒，表示衷心擁護後者。一九七七年三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中爲鄧平反，鄧又寫信表示感謝並願接受批評和教導。五月中共中央將鄧的兩封信向全黨公布，鄧始於七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獲准復出並恢復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以：一、必須擁華；二、不能反毛，爲條件<sup>⑦</sup>。

鄧小平再度復出後，與華國鋒、葉劍英形成集體領導。但不久，鄧就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口號，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北平的「光明日報」卽以此爲題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此後，對毛澤東思想的批判就在大陸展開。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撤除了華國鋒的支持者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人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此後，領導幹部的任期制，以及所謂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雖是由華國鋒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中提出，但這乃是鄧小平所決定的路線，其中仍含有權力鬭爭的作用在。

鄧小平要廢除領導幹部的終身制，並將黨政分開以免幹部兼職過多，就其防止個人崇拜的意義來說，實無可厚非。但當時那確實含有排斥華國鋒的作用，也是大家所公認的。而黨政職務分開之舉，創自南斯拉夫，迄今仍未定型，因爲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SKI)不能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本文執筆時，中共也並未將黨政職務分開普遍化和澈底化。

至於中共領導幹部的素質，據其組織部長宋任窮指出其弱點是：年紀大、知識低、受封建思想影響(指特權思想)<sup>⑧</sup>。如此說來，實行任期制並限制任職年齡，以求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原也是應該的。但問題並不如如此簡單。所謂幹部任期，是黑魯曉夫首先提倡的。一九六一年十月在黑魯曉夫主持下的蘇共第廿二次大會，通過了蘇共的新綱領並修改黨章，規定在每次定期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及其主席團(現政治局)的成員至少更換四分之一，連續當選一般不得超過三屆；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黨的邊疆區委、州委的成員至少更換三分之一，連續當選不得超過三屆；黨的專區委、市委、區委基層黨組織的黨委會或支委會的成員至少更換一半，連續當選不得超過三屆；基層黨組織的書記連續當選不得超過兩屆<sup>⑨</sup>。地方蘇維埃(Soviets)定期選舉的規定，亦與此大致相彷彿。

當時中共抨擊蘇共的新綱領是一個修正主義(revisionism)綱領，指摘黑魯曉夫的改革是排除異己的手段。中共說，一九五二年蘇共第十九次大會選出的中委，經過廿次、廿二次大會，就清洗了近百分之七十。又一九五六年廿次大會選出的中委，在

註⑦ 參閱張敬文「華國鋒與鄧小平矛盾鬥爭的新發展」，「匪情月報」第廿一卷第五期(臺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版)九一〇頁。

註⑧ 宋任窮「認真解決組織工作面臨的新課題」，「紅旗」雜誌(一九八〇年)第十六期。原文所談三弱點文字較長，經香港「文匯報」(同年八月廿一日)在標題中要約如引文。

註⑨ 科茲洛夫(Frol R. Kozlov)「關於修改蘇共黨章的報告」，「人民日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日)第五版。

一九六一年廿二次大會時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廿二次大會前夕，據不完全的統計，黑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藉口「幹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邊疆區黨委和州委的成員撤換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區委的成員撤換了百分之四十。中共不僅對蘇共廿二大的新黨綱、黨章抱否定態度，甚至說，一九六三年黑魯曉夫集團又藉口劃分所謂「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把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和州黨委會成員撤換了一半以上<sup>②</sup>。有趣的是鄧小平現今準備實行的幹部任期與幹部更新制，是否和黑魯曉夫抱有同樣目的——整肅異己呢？

一九六六年三月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廿三次大會上指摘，頻繁地更換幹部，會縮小熟練的、有經驗的黨活動家之選任範圍，因之，再度修改黨章，將任期制廢除。中共的幹部任期制尚未開始實施，但反對之聲已有所聞。一部分是文革派餘黨，一部分是年高權大而又不太聽話的幹部，很可能在任期制中被鄧小平刷掉。中共幹部認為「有權力就有一切」，有些老幹部即使可轉任顧問，那也是由權力高峯跌落下來，未必心甘情願。在中共一、九二〇多萬幹部<sup>③</sup>中，究竟有多少人真誠擁護幹部任期制，是值得懷疑的。葉劍英久已前赴廣州，經彭真等親往勸駕，仍然不肯返回北平。他以五屆「人代常委會」委員長身份，竟不出席主持該會第十七次會議，那是對鄧小平路線與作風的抵制與抗議。中共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和十二次代表大會已一延再延，鄧小平的若干政策就無法通過施行。這些顯示中共內部距離安定團結尚遠，自由世界既不便也不能插手中共的權力鬭爭，而一個缺少政治安定的政權，其對外交流也會缺少穩定性。

## 六

在黑魯曉夫改革時期，人們曾希望共產世界向「右」一些，自由世界向「左」一些，二者可能終將合流。事後證明這種想法落了空。如今，人們把鄧小平已經拒絕的「中國的黑魯曉夫」頭銜加在他身上，希望他可以促使中共「自由化」，變得容易接近，事實上仍然不可能。

鄧小平確實想藉自由世界之助，完成中共的四個現代化。不過，現今他自己也缺乏信心。他對日本內閣的六位大臣說：「在經濟建設方面，搞現代化走什麼路，我們缺乏經驗」<sup>④</sup>。近來中共時常強調「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那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或許還在摸索之中，但可以肯定地說，那不是西方的自由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又表示，「有些已經確定的合作項目，超過了

註<sup>①</sup> 「關於黑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第一一五版。

註<sup>②</sup> 《莫斯科電臺》（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華語廣播評《紅旗》雜誌談大陸不穩定因素時，稱中共有一、九二〇多萬幹部。

註<sup>③</sup> 《中國新聞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四日）北平電，香港《文匯報》（同月五日）第一版。

我們自己的能力」<sup>23</sup>。這表示，中共至少在短期內不再大量引進西方的技術設備，它要利用原有的工廠設備謀求增產。這些工廠的技術設備都是蘇聯製的，因此，一九七九年中共和蘇聯的貿易總額為三三、二五〇萬盧布，蘇聯輸往中共一七、五二〇萬盧布，輸出品類中約三分之二為機械、設備等，其中包括採煤設備、農業機械、拖拉機、卡車、乘用車等<sup>24</sup>。另據日本「週刊文春」雜誌一九八一年三月號透露，一九八〇年中共會由蘇聯進口二、〇〇〇部汽車<sup>25</sup>。如此看來，中共在經濟方面擺脫蘇聯模式而走向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事實上極為困難。

中共在鄧小平的主持下，確曾實行若干經濟改革，例如注重物質刺激、提高企業自主權等，業經部分實施。不過，這些改革不自中共始，不少共黨國家都曾實行過。就是因為經濟改革和柯錫金(Aleksey N. Kosygin)鬧意見的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八一年二月開始的蘇共第廿六次大會上，也倡言要學習兄弟國家的若干作法<sup>26</sup>。

匈牙利自一九六八年一月起實施新的經濟管理制度(New Economic Management)，着重擴大企業自主權和改革價格制度。其作法是在計劃經濟範圍內：(1)容許企業追求利潤，以提高其效率；(2)提高企業在雇用(包括從業員人數、工資等)、投資(可利用本身利潤積蓄充實本身生產設備)、生產內容(包括項目、數量、價格等)等方面的自主權；(3)某種程度地引進市場經濟機能(包括競爭原理及兼顧成本等)，以謀供需平衡；(4)將生產及消費價格分為三類：(A)固定價格(官定價格，未經核准不得變動)、(B)協議價格(規定上下限度，在限度內可由買賣雙方議價)、(C)自由價格等，以有限引進價格原理。

在共黨國家中，匈牙利的經濟改革較具成效，但從一九七〇年起，已出現過剩投資、貿易赤字激增、企業幹部與勞動者之間所得差距擴大等弊端，以致負責的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被牽連更迭。

中共經濟改革有些是效法匈牙利，但它的經濟基礎較差而弊端發生的快速與嚴重，則遠超過匈牙利。目前，中共正謀減少基建投資，惟因各企業利潤提成較前擴大，各企業盲目擴建，重複投資，以小擠大<sup>27</sup>，使得基本建設戰線無法縮短，投資總額反有增加。至於中共的物價管理，顯然是一大失敗。如今中共的各級投資又要中央核准，不准濫發獎金，對剛剛允准的小販又禁其沿街叫賣。它已重新重視精神因素，恢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及「學習雷鋒運動」，再度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等工作等。

註<sup>23</sup> 同註<sup>22</sup>。

註<sup>24</sup> ^ APN通信稿，日本(世界情勢)雜誌第二四卷第二號四四頁。

註<sup>25</sup> 臺北，「聯合報」，「觀察站」欄，該報(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第四版。

註<sup>26</sup> 在蘇共第廿六次大會的報告中，布里茲涅夫列舉匈牙利的農業合作組合及企業組織，東德對能源的利用，捷克的社會保障制度，都值得蘇聯學習。

註<sup>27</sup> 如棉花產地的企業自建產品低劣的小型紡織廠，却使上海、天津等地大型紡織廠缺乏棉花供應。



爲了克服現存的「三信危機」<sup>⑳</sup>，鄧小平於一九八〇年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對黨內外的反對傾向，要進行批判、教育和必要的鬭爭。他說明中共經濟調整的八字方針（調整、改革、整頓、提高），重點在調整，改革要服從調整，要對調整有利。他指稱毛澤東是功績第一、錯誤第二，誇大毛的過錯，會有損黨和國家的體面，有傷社會主義制度的威信，削弱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特別強調，在批判封建主義的同時，更要反對崇拜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主張、「眼向錢看」的思想、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等。他說，「我們」繼續同友好的西方國家交流，是要學資本主義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在思想和政治的領域內，就要和它斷然地從事鬭爭。否則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會被種種資本主義勢力所蛀蝕。

鄧小平在講話中，歷述了大陸各地的混亂情況，而後聲稱，對若干地區的重大騷動，要在慎重的必要考慮和周全的準備的基礎上，由地方政府發出戒嚴令，出動有充分訓練的軍隊，使社會秩序恢復正常。他強調不能容許有些壞份子搞第二次文革，要用國家的力量，對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刑事犯罪份子加以打擊，以保社會安定<sup>㉑</sup>。由於這次講話，日本「朝日新聞」稱，鄧小平已變成了「鷹派」(Hawks)<sup>㉒</sup>。這也顯示，中共無法成爲一個自由的夥伴。

## 七

中共是否一個地區性強權，是一個疑問；它有無維持區域性安全的能力與意願，是又一個疑問。對於不在臺海使用武力及不對亞洲鄰國的共黨勢力予以支援，中共從不作出任何承諾。一九七九年二月爲「教訓」「懲戒」越南而掀起戰爭，並非有益區域和平與安全之舉，而且極可能含有挑起美蘇衝突的動機。中共軍力不足以攻擊蘇聯，它對蘇聯兵力的牽制，未能減少蘇聯對歐洲的威脅。而蘇聯加強其遠東的軍力，是否單純爲了對付中共，也還值得考慮。

當然，美、日、中共都以蘇聯爲假想敵，應該是不錯的。蘇日之間的領土問題難以解決，但日本有意在「全方位外交」的政策下，與北平和莫斯科保持等距離。過去，日本對與蘇聯合作開發西伯利亞資源態度謹慎，它對中國大陸市場及那裏的石油等能源供應抱有極大希望。距今十五年前專爲與中共從事貿易而設的日本「產業貿易公司」已於今年三月十二日宣告破產，中共石油產量大幅度降低，連已允諾提供日本的數量也難如約履行。今後日本會不會轉投注意於西伯利亞的石油等資源，不能令人不表關

註<sup>⑳</sup> 「三信危機」指大陸人民包括若干共黨幹部，對共產主義失去信仰，對中共領導失去信任，對現代化失去信心。

註<sup>㉑</sup>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參閱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第四面所刊內容要點。

註<sup>㉒</sup> 同註<sup>㉑</sup>，日本《朝日新聞》駐北平橋本特派員報導標題中語。

心。

美國對蘇聯召開高峯會議的建議非常謹慎，認為在蘇聯沒有具體事實表示它從阿富汗撤軍或收斂其擴張行動之前，高峯會議召開無益。但我們不認為這是恢復「冷戰」，而美國的目的也不在和蘇聯長期維持緊張或對峙。

中共和蘇聯的分歧已走得太遠，無法恢復五十年代的關係。在蘇共第廿六次大會之後，布里茲涅夫對外發動信件攻勢，除寫信給自由世界各主要國家之外，他也給中共寫了一封信，建議在「蘇聯、中國和日本這幾個國家相互接壤的遠東」地區，也採取互相通報軍事演習和軍事調動活動的「信任措施」，經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新華社」記者述評指為「布里茲涅夫的誘餌」，而予以拒絕。

不過，認為中共和蘇聯的惡劣關係已經長期的固定化，怕也並非事實。中共一方面鼓吹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一方面聲言它自己需要若干年的和平時間來促進現代化，那不是無心的巧合。中共「人民日報」，指摘蘇聯的東亞戰略，第一是從西太平洋趕走美國，把蘇聯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部署同在印度洋、紅海、北大西洋的部署聯繫起來，成為全球戰略的有機環節；第二是企圖包圍中共；第三是用威脅利誘制服日本；第四是逐步設法控制東南亞國家<sup>②</sup>。如此說法，上述四方面聯合反霸，才是合乎邏輯的應有結論。不過，在同一篇文章中，却又說：「目前在西伯利亞邊界之外，中國是受蘇聯威脅的國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對蘇聯形成威脅」<sup>③</sup>。這就顯得有些不諧和了。

依蘇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的古杜希尼科夫博士(Dr. L. M. Gudoshnikov)的說法，中共內部已經不提「蘇聯修正主義」，官方場合也不說「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了<sup>④</sup>。又，布里茲涅夫在蘇共廿六次大會報告時，把對中共的政策，仍然列入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部分提出。雙方既都承認對方是社會主義國家，何以蘇聯對中共構成威脅，而中共對蘇聯不形成威脅，豈不令人尋味？

中共對外活動，論其最終目標——世界革命是不變的，論其具體的政策或策略則是多變的。就其各個時期對外活動的重點或特色大致說來，一九五〇年代前半，中共向蘇聯「一邊倒」，且一度隨同蘇聯對外發動和平攻勢；五〇年代後半，中共與蘇聯發生齟齬，反美旗幟更加鮮明；六〇年代前半，中共與蘇聯分裂，乃以亞、非、拉為活動舞台，煽動反帝反殖；六〇年代後半，由「中間地帶論」逐漸演化出反美反蘇統一戰線；七〇年代前半，以「三個世界」理論反超反霸；七〇年代後半，將對外活動重心移至第二世界及第一世界的美國，反霸已成反蘇代語，却同時為蘇聯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目前的作法是利用鬭爭求生存，

註① 蔣元樞「論蘇聯的東亞戰略」，〔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第七版。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五日）第七面。

但注意不把它和蘇聯的關係拉出規定的距離。依中共過去歷史看來，其對外政策很少可能超過五年而不變更。同時可以發現，中共雖有永遠的敵人——最終要埋葬的自由世界，却沒有永遠的朋友。就中共言，蘇聯已由親成仇；耗費二〇〇億美元援助的越共，如今已倒戈相向；長期的朋友阿爾巴尼亞也翻了臉；接受中共援助修築鐵路的坦桑尼亞，也有了意見。原因是中共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而迅速轉身，它強人同己（如強求他人一同反蘇）而不顧對方的利害，旁人是無法長期適應的。

如果說，中共對內的經濟危機，主要來自制度本身，其經濟改革無法突破制度的阻礙而獲致成功，那是對的。同樣，中共對外儘可「利用鬪爭求生存」而採取一些短期的大膽策略，但終因制度的阻隔而無法成爲美、日乃至其他自由國家的真正「夥伴」，那也應該是對的。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研究員兼俄情組召集人）

##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本彙編爲20開本，全一冊，約五十餘萬字，內容分七大類，包括文件七十六件，屬限閱資料，憑機關公函購用。

英文版每冊 新台幣八〇〇元  
美 金二十二元五角

郵資另加：（平郵掛號）  
國內 新臺幣十二元  
外 美 金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